

杜维明 著

对话与创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话与创新

DUIHUA YU CHUANGXIN

杜维明 著

9312/1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与创新/杜维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7-5633-5267-8

I. 对… II. 杜…

III. 文化—国际化—研究 IV.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539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4.25 字数:160千字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册 定价:18.00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1996年,我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同时开展了四个论域:“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其实,这四个论域早在80年代已成为我所关注的议题了。我想通过“诠释实践”,探讨它们各自的内部逻辑、相互关联以及现实意义,为提出一种深含人文精神的哲学理念打下基础。15年前,我曾对友人说,这项工作我能做,但难度很大,如果能做出来,就算我在中文和英语学术界服务多年的一点贡献吧。这本书所涉及的议题和我想建构的理念有密切的关系,但只是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而已。

2001年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邀请,我参加了“文明对话”小组,深感“文化中国”、“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必须在各种文明的对话氛围中进行,本书所收集的访谈与演说就体现了这一认知。我把这本论文集分成“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两部分,但是它们又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我在文明对话中阐述儒家现况和前景,同时汲取儒家精神资源来丰富文明对话。

由四川大学《中外文化与文论》安排的访谈(2001年)所涉猎的课题较多,可以作为“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之间的桥梁。跨越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是我一贯的主张。“以边缘为

中心”、“现代性中的传统”以及“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都是我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观点。

何谓人？从哪里来？（创造？演化？）到哪里去？（天堂地狱？还是物质不灭？）人能认识客观永恒的真理吗？人能继承赋予人生意义的文化传统吗？人能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吗？我们如何知？如何行？如何信？如何为人？等等，都是有史以来先知先觉从未间断思考的课题。我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今天，人自身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淡漠，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榨取、挥霍、破坏、变质、枯竭，很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再加上一些老问题：性别种族宗教之间的歧视，掠夺资源的战争，甚至自生民以来从未动摇的信念也受到了质疑；人这个物种是否还能存活下去也变成了未知数。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对自身、社会、自然和天道都应作深层的体知。儒家传统是人类精神文明之一，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一样，也许能为解决当前人类的困境提供一些精神资源。通过文明对话，我们可以较平实地认识、理解和分析儒家的得失。我们希望儒家积极参与塑造文化中国的认同。我们不知道儒家能否弥补西方启蒙之不足，但我们必须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的心态和个人利益至上的行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为了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体人类的福祉。

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态度向西方学习，是儒家自我更新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我期待儒家能从“一阳来复”逐步走向“否极泰来”。虽然我有忧患意识，虽然人类当前的处境不能使我有任何乐观的奢望，但我并不气馁。儒家被东亚，尤其是被中国的知识精英唾弃，边缘化有年，不可能也不应期待其回归中心。其实，边缘也是一种机遇，它可以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我

认为儒家伦理仍然是塑造东亚现代性的重要因素,表面看今天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及海外华人社会,经过了全盘西化、现代化,“文化传统”中的传统文化已经很薄弱,但它仍然深藏于衣食住行和为人处事的生活哲学中。

儒家伦理历经劫难,但仍然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我认为从曲阜到中原,从中国到东亚的儒家传统具有深刻的普世价值,也是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过,要实现这一学术理想,路还很遥远。

本书的访谈和演说,结构松散,思路随意,重复之处甚多,但容易阅读。《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是为“文明对话”小组提供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而写的(2001年11月7日),《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两篇英文作品,发表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学报 *Daedalus*。

朋友们如果愿意先翻阅访谈和演说,再细读三篇中译的专论,对我目前思考全球化冲击下的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会有较完整的印象。我所设法扩展的论域不属私产,而是向中国、东亚,乃至全球开放的公共空间。欢迎大家,特别是青年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共同的事业。

2004年11月25日(感恩节)
美国康桥布兰居文明

目 录

序言	1
文明对话:背景·旨趣·路径	1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16
全球化与本土化	33
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	44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传达的信息	79
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	93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21
新儒家的创新	139
儒教东亚兴起的文化含义	159
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	182

文明对话：背景·旨趣·路径*

- 杜维明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 杨学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背 景

○ 近年来，您一直在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方面出现了很多议论，比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请问，您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的背景是什么？

●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儒学有兴趣。到了大学时代，可以说已经开始考虑“东西文化对话”的问题了。那时我在台湾的东海大学念书，接触到不少美国精英大学如普林斯顿、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到那里去教英文，包括会话和写作。当时我与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关于中西文化，或者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讨论。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用一段话来描写自己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对话。

1962年到哈佛念书以后，这项工作被继续了下来。我当时在

* 原载《寻根》，4～14页，2003（2）。

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儒家传统为主,同时对美国思想史,对欧洲 17、18 世纪的思想史,特别是对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也有兴趣。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一些杰出的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艾森斯达(S. N. Eisenstadt)。心理学界继承弗洛伊德而且发扬光大的艾瑞克森(Erikson)教授,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Identity”(我把它翻译为“认同”)的问题,对我极有启发,1966 年回到台湾在母校东海大学开设“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的课程,就是想通过“认同”来了解中国的现代转化。现在我们所谓的“认同”,包括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等,这个课题就接触到文化传统的问题,进一步说,即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

每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自觉与否,在他的文化心理或文化传统中,多多少少已经有了各种不同文化思想因素的碰撞和对话,古和今的对话,中与西的对话,但常常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张力,甚至是急躁。这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从甲午战争又特别是从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的知识界一百多年来几代知识人都碰到的问题,是每一个希望了解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碰到的问题。

我到哈佛的时候,正是美国各种不同文化碰撞的时候,也是美国知识社会的强势刚刚开始的时候。“现代化”如果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就是 Modernization,它在西方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正式提出的。哈佛是当时美国现代化理论的重镇,所以很多人认为 Modernization 是在 50 年代才出现的论域。殊不知中国在 30 年代已经讨论过西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包括文化特殊性、普遍性等问题都提上议程了。可惜的是,60 年代台湾的东西文化论战(我也参加了),80 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化热,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超出 30 年代的水平。

在哈佛有一位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从60年代开始,我跟他进行了长期对话。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8年提出了“轴心文明”(Axial-Age Civilization)的概念。作为比较宗教学的历史学家,史密斯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精神文明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如印度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古希腊的哲学,由早期的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时史密斯就在上这些课,基本上是文明对话的课。主要的关注点是轴心文明之间如何通过讨论、辩难、对话,形成一种共识,这是人类走向和平文化最核心的一个大问题,我一直感到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 事实上您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 1969年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在夏威夷召开东西哲学家会议,有一个德国的学者本尼可夫(Fisher Barnicoff),他跟我说,他们要在海德堡成立一个比较文化或交互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Research)中心,在世界各地找一百多位哲学家,完全在和平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几个文明区,即欧洲、美洲、伊斯兰、东亚儒家文明、南亚和非洲之间的对话。他们找到香港的唐君毅先生、日本的西谷启志(日本京都学派的祭酒),还找了伊斯兰的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我后来也参加了。我们都把文明对话看作一项共同的事业,继续不断的努力,希望它能成为知识界所关注的论域。所以这个课题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中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夏威夷东西中心出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我在哈佛请假一年。那时李浩(Victor Li)是中心的总裁,他问我如果去的话需要发展什么研究,我就说要发展文明对话。我后来发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文化中国,另一个就是文明对话。关于文化中国,后来我们发表了很多东西。文明对话的难度较大,

我们开了好几次国际学术会议,把世界各大文明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也积极参加了有关世界精神性的大型出版工程,预计 25 本分量很重的论文集涵盖人类精神文明的全貌,由神学家及宗教史学家柯森思(Ewert Cousins)任主编,因为关于文明对话的课题,他已酝酿了 30 年。我与他合作,在夏威夷进行了多次讨论,举办了 8 次国际会议,提出了几个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是文明对话除了主要的轴心文明以外,还应包括原住民的传统(Indigenous Rraditions)。我们召开了夏威夷原住民、美国本土印第安原住民文明和日本神道等传统的会议,当然也包括非洲。

所以关于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或者是比较精神文明,一直在做,而且做得比较扎实,很多对话早就在进行。

到了 1993 年,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其实这个问题在宗教、哲学等人文学界已讨论得相当热络。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又有冷战背景,亨廷顿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文明对话的问题从学术界、宗教研究扩展到整个知识界,甚至国际政治领域。这里面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非常有趣,有种非常流行的观念,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凡俗化、世俗化的过程,是对神圣的解构。因为现代文明属于物质文明,属于工具理性,属于实证主义,属于科学主义,跟以前孔德所谓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经过哲学再到科学,还有韦伯提到的现代化是合理的过程类似,在 20 世纪中期,许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一个凡俗化、世俗化的过程,宗教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小,仿佛启蒙的理性把迷信的黑暗彻底驱逐掉了。但是,50 年代以后,学术界逐渐发现了宗教的重要性,而且越来越重要。宗教的重要性后面隐含着文化的重要性,以前把文化当成上层结构,认为经济变了,文化一定变,后来发

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甚至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也认为,21世纪文化和宗教的问题特别突出。2000年,他们第一次请我去参加并主持讨论,当时主要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宗教在21世纪的地位,另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些都是不能够用经济规律来解释的、不可量化的现象。

旨 趣

○ 可以看出,您关注文明对话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回应。那么在您看来,文明对话的旨趣何在呢?

● 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即轴心文明面向21世纪将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作为轴心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传统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那么大的摧残?面向21世纪它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对此大家都有所质疑,而且质疑的人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就是真正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最重要的一批学人。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提到“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没有人会怀疑基督教在21世纪有没有影响,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也不存在这种质疑。那么儒家是不是宗教就值得考虑,儒家是不是哲学等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所了解的儒家传统是从轴心文明的角度切入的。前面提到的史密斯、西谷启志、潘尼卡(Raimundo Panikkar)和修士顿·史密斯(Huston Smith)、纳瑟(H. Nasr)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21世纪都会大行其道,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家就会销声匿迹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问题。

○ 文明对话有助于中国传统价值的发扬和光大吗?

● 有一种看法,现在事实上在美国还非常流行,就是认为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仅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特色,甚至其背后所含蕴的价值也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很多中国的学者也认为,我们的发展还在前现代,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民主。我并不反对启蒙,我是完全赞成启蒙的,但我认为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论域,面对现代人类所碰到的处境,它的资源不够。不是说它的资源不好,而是不够。即使把它的资源全部充分发挥,仍然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它有几个很大的缺失。第一个大的缺失是启蒙所代表的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办法处理生态环保的问题。另外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工具理性,由于其强势的工具理性,人类社群的和平共处就很难;同时它也代表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所以它对整个轴心文明所体现的人的精神性是淡漠的,因为它本来是从反宗教中发展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跟西方现代文明紧密结合的精神文明。他们忘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等都是强烈反基督教的,特别反对教士、反对教会。按照韦伯的理论,只有基督新教伦理才能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我们不做基督徒就发展不起来。儒家的论说正好说明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发展起来,日本就不是基督教国家,但它可以现代化。基督教是否一定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缺失的伦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韦伯的历史分析基本上站得住,但不能和结构分析混为一谈。

我认为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精神文明的传统,比如犹太教的传统、兴都教

传统、儒家的传统、佛教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也可以起相似的作用。这样说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有没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的出现。这里牵涉两个预设:一个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时候,它所代表的现代性一定要和它的民族特色、民族的传统特色结合起来,所以法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都不同,市场经济也不同,政府的角色也不同,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然有些原则不能违背,如人权的原则、效率的原则、公平的原则、民主的原则等。另一个则是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

从洛克开始,西方自由主义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只是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人文视野,还要把两个向度加进来。一个向度就是自然,整个人类全体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根本没有提出来;另一个向度就是整个人类和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即人类与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他也没有提到。哈贝马斯(Habermas)是欧洲中心主义,他不了解欧洲以外的文化,比如他对东亚文化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德里达(Derrida)也是一样,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大概也不例外。

这样说来,你要四个侧面同时考虑,你不能够把复杂的四个侧面的体的问题变成两个侧面的面的问题,乃至变成线的问题,变成点的问题。四个侧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群,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即宗教、终极关怀。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还有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安顿。

在儒家看来,个人安顿的问题就是修身的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后就是个人和家庭、人类社群如何联系的问题;另外

还有,人和自然能不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视域比较宽广。但其宽广的人文视域确实是被比较狭窄但又有很大冲力的、以西方现代启蒙所代表的凡俗的人文精神给消解掉了,消解得非常彻底,认为儒家代表小农经济,代表血缘社会,代表专制政体,没有主体性的出现,跟工业社会没有关系,跟民主政治相违背。但是儒家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已经有好几代人做了努力,怎样适应西方,怎样自我转化,儒家的现代化就是这一百多年的努力。儒家所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现在完全被解构、扬弃了,哪一个从事儒家研究的人还在提倡三纲呢?因为三纲既不符合女性主义所代表的男女平权,又不是民主政治的观念,同时也不符合强调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的现代教育原则。但是五伦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和夫妇有别是双轨的、互动的,并没有过时。还有五常呢?仁、义、礼、智、信的观念,这些都不能简单否定。

儒家那些高度政治化的东西要去掉。儒教中国的崩溃就在于清帝国的崩溃,科举制度的崩溃,专制政体的崩溃。各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事实上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创造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生机。它的等级制度是站不住的,但是儒家经过现代转化,经过自我批判、自我澄清,是能够发展起来的。如果它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不仅能够赞同,而且能够吸收,那么它是不是还有许多西方没有的资源也可以提供呢?我认为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于公义的看法,同情或者礼仪(文明礼貌)的观念;还有义务的观念;还有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仅仅是孤立绝缘的个人。从这些方面看来,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补启蒙之不足。一方面赞成启蒙,另一方面又补启蒙之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展开出

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生态环保、女性主义、文化多元,需要有一种普世伦理,这些在儒家传统里面资源很丰富。儒家注重个人发展,它是“为己之学”,所以在儒家传统里没有限制经典的解释权。对经典的解释权,比如天主教,甚至佛教,都有性别上的歧视,但儒家没有。假如我是女性,我成为《论语》的专家——现在文化中国很多讲人文学的都是女性的教授——我就有权利和义务通过诠释、发挥,为儒学再生作出贡献。一个女性来教《四书》和一个男性来教《四书》,在儒家传统里面没有性别歧视可言。

○ 但是在参与文明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各种文明,包括处在不同文明中的群体和个体的力量并不是均衡的。

● 可能过分乐观,我的一种想法是,凡是越有权有势、掌握资源越多的,就越应该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人类和平文化作出更好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的一种看法。但实际上,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确实非常不公平。像亨廷顿提出几大文明的冲突,他非常露骨地说他的立场就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所谓西方和西方之外,意思是将来所有西方之外都要跟西方趋同。我有一位师友之间的朋友、同事叫贝尔(Daniel Bell),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之外还有没有现代性,或者说有没有和西方不尽相同的现代性。他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当然,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其他的可能都不会导致灾难,只有一种成功的案例,就是西方的现代性。他的想法很简单。亨廷顿所谓两大挑战,一大挑战是伊斯兰,另外一种挑战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的挑战是什么?不管是新加坡提出也罢,中国提出也罢,就是权威主义。

○ 据我所知,您在大约10年前就参与了世界宗教议会发起

的倡导全球伦理的运动,1993年公布了一个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即全球伦理。您曾经讲到,全球伦理的基础是共同价值,文明对话显然有助于或者说有必要促成一种共同价值的生成。与此同时,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又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

● 有一个想法值得参考,就是1948年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现在看来他是对的。这些在公元前出现的有着2000年历史的几大文明,一直到20世纪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他当时提出四个对人类文明的塑造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人:一个是苏格拉底,代表希腊文明;一个是孔子,代表儒家文明;一个是释迦牟尼,代表佛教文明;一个是耶稣,代表基督教文明。现在当然不能不提穆罕默德,代表伊斯兰文明。不管怎样,这些人现在还有影响,这意味着不同的轴心文明仍然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展,并发挥作用。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合作或者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都有。

现在我们重新回顾,是不是第二个轴心文明出现了?什么意思呢?以前的轴心文明或者在儒家文明中生长,或者在印度教文明中生长,或者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生长,你所生长的世界与你的信仰、你的价值取向常常相同。可是现在,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多元的倾向非常明显,通过媒体,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在起作用。一方面,世界生命共同体出现了;另一方面,分化的现象也非常剧烈,包括国家的分化、社区的分化,所以分化的过程和整合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分化是多元多样的,并不一定意味着矛盾冲突,但是分化有造成矛盾冲突的危险。我曾界定为根源性的东西,如性别、种族、语言、年龄、阶级、地域、宗教等,都成为分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如果政治化以后,本来是和平共存的,一下子就会变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